

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

——基于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工的问卷调查

刘林平 郑广怀 孙中伟

提要:受“富士康事件”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基于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在我们的样本中,14.7%的外来工是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虽然与普通群体(如学生、护士、普通市民等)相比,其精神健康问题并不特别突出,但是与劳动权益状况密切相关。Logit回归分析表明,超时加班、工作环境有危害和强迫劳动会恶化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社会网络对调节外来工精神健康作用甚微。在当前的用工模式下,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损害工人精神健康的分析仍然符合中国现实。我们主张,精神健康是劳动权益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劳动权益 外来工 精神健康

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台州、佛山等地外来工自杀事件(“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2010;田国垒、吉玲2010;陈荣炎等2010)接连发生,这些事件迅速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闻焦点,外来工的精神健康也因此受到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以及民众的普遍关注。并且引发了诸多争议,如员工精神健康更多地与管理体制还是人格特质有关;更多地与工作场所,还是生活空间有关?有一种观点认为富士康的工资并非是珠三角最低的,加班不是珠三角最严重的,因此推测劳动权益状况不是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主要原因(黄小伟,2010;徐明天,2010)。这类观点建立在富士康个案之上,缺乏对珠三角地区和其他区域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全面调查,是有待证实或证伪的。

对于白领而言,劳动权益或许不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的工作环境较好、福利待遇较高,劳动权益较少遭受侵害,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存在的精神健康与劳动权益保障可能关联度不高。而外来工则不同,

* 本文是中山大学刘林平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09JZD0032)”的成果之一。衷心感谢本刊匿名审稿人关于精神健康核心概念以及抽样说明等方面的修改建议,本文的多次修改得益于匿名审稿人和编辑的中肯意见。

诸多研究表明,由于制度和人力资本的约束,他们的工作环境一般较差、福利待遇较低,劳动和人身权益经常受到侵害,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状况,因而劳动权益与其精神健康之间可能直接相关。

2010年7月,我们对珠三角和长三角4000余位外来工^①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国际上常用的12项一般健康量表(12 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以下简称GHQ-12)对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进行了专项测量。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测量数据,在总结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外来工精神健康现状及与劳动权益的关系做一初步探讨。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 心理学和医学研究的现状及不足

目前对外来工精神健康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医学领域(何雪松等,2010),大致分为精神健康现状描述和影响因素分析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既有研究主要有如下发现:首先,外来工较普遍存在精神健康问题(李晓芳,2004;何雪松等,2010);其次,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比全国平均水平差,心理问题发生率比一般群体高(李晓芳,2004;徐香芬等,2006;龚承柱等,2008;廖传景等,2010);再次,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比本地工差(Shen et. al,1998)。

就影响因素而言,既有研究集中分析了流动压力、社会支持、生活事件及应对方式等对外来工精神健康的影响。何雪松等(2010)的研究认为,移民压力、社会支持和迁移意义以不同的路径影响外来工的精神健康。斯诺等(Snow et. al,2003)则分析了工作场所压力源^②、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员工精神健康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工作相关的社

① 本次调查的外来工是指大专及以上学历、跨区县流动、被企业或单位正式雇佣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包括少量符合条件的城镇户口者,但主体是农民工(占83.5%)。我们在模型中曾尝试加入户籍变量,但发现对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也不影响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和作用的方向性。因此本文中,我们对“农民工”和“外来工”不做区分。

② 心理学上认为,心理问题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Lazarus & Folkman,1984),当个体意识到不能恰当应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威胁时,压力就产生了。若缺乏有效应对措施,就会产生焦虑、抑郁、沮丧、失眠、甚至失去信心等心理问题。压力(stress)概念是指个体不能有效应对身体或环境刺激所导致的生理或心理失去平衡的一种紧张状态,而那些具有威胁性或伤害性并因此给个体造成压力的事件或环境就是压力源(Selye,1976)。由此,压力可理解为由压力源、对压力源的评估及可能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所构成的动态过程。

会支持可以降低工作压力,同时提高积极应对方式的使用;工作压力源是工作相关的社会支持与心理症状之间的中介变量。黄富强和梁淑雯(Wong & Leung 2008)的研究发现,流动压力(特别是“经济和就业的困难”和“人际关系困难”)是影响精神健康的显著因素之一。钱胜等人(2008)则指出,负性生活事件^①是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

尽管上述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地讨论了外来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但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可能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权益状况(包括人身和劳动权益)。而在当代中国,外来工的权益普遍被侵犯是一个既存并被公认的事实(Chan 2001; Chen 2007,“外来农民工”课题组,1995;刘林平、郭志坚,2004;万向东等,2006;谢勇,2008;蔡禾等,2009)。在此情况下,分析外来工的权益状况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就尤为必要。

(二) 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与心理学从个体角度解释心理问题不同,社会学主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解释。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探讨了生产劳动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他认为,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是异化劳动。“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失、精神遭到摧残”(马克思,1979:47)。马克思的论述包含着两个涵义:其一,生产劳动过程直接影响工人精神健康;其二,工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主要是在其工作单位或工作场所产生的。

在马克思之后,布雷弗曼(1978)、布若威(2008)等人基本都坚持了马克思的观点。潘毅(2007)则具体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深圳工厂女工的个案,她对一位女工的梦魇和尖叫做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工厂超时劳动所引发的一种类似创伤性精神官能症的病症。

与马克思关注劳动过程不同,迪尔凯姆(1996)则从社会整合的角度对个人的精神健康进行解释,他认为社会失范是造成精神健康问题

^① 负性生活事件是指个体所经历的诸如亲人丧亡、夫妻离异、失恋、失业或退休、疾病或伤残、被侮辱等给身体或心理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它会使个体产生不安、消沉、焦虑、恐惧等情绪,是个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胡军生、程淑珍,2008)。

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定程度的社会整合有利于个人的精神健康。迪尔凯姆的理论可以视为社会网络学派分析精神健康的先声。

社会网络是近年来外来工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社会网络具有向其成员提供功能性、情感性和社会交往支持的功能(Van del Poel, 1993; Sherraden & Martin, 1994)。大量经验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无论对身体健康还是精神健康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Jacobson, 1986; House et al., 1988; Lin & Ensel, 1989; 赵延东, 2008; 何雪松等, 2010)。黄富强和梁淑雯(Wong & Leung, 2008)研究发现社会伙伴支持对外来工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工具性支持显著影响外来男工的精神健康,而尊重支持显著影响女工的精神健康;此外,该研究还发现,社会伙伴支持是影响流动压力和外来女工精神健康关系的调节变量。

尽管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关注到了外来工的权益状况,但并未在权益状况与个体精神健康之间建立联系,本文认为,这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其一,社会学主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关注外来工的公平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等群体心理,认为户籍制度以及由此所衍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农民工普遍感到被排斥,产生自卑、孤独、失落、不满等心理的主要原因(王春光 2001, 2006; 朱力 2002; 朱考金 2003; 康来云 2004; 李培林、李炜 2007, 2010)相对忽视了行动者个体的心理因素;其二,国内社会学界主要使用问卷调查,较少使用成熟的心理或医学量表,难以对心理问题进行客观和全面的测量(赵延东 2008; 陈黎 2010);其三,一些研究采用个案进行分析,对权益状况影响精神健康的解释主观性较强,难以确证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推论到整个群体。

综上所述,就外来工精神健康而言,心理学和医学的研究忽视了权益状况这一重要影响因素,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缺少有效的测量工具。为了弥合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尝试在控制个人特征、组织特征等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探讨权益状况与精神健康的关系。

(三) 研究假设

基于既有文献,我们认为,权益受损和劳动条件恶劣可能损害外来工的精神健康,而社会支持则有益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为此,我们提出三项基本假设:

假设 1: 劳动权益状况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具体而言:

1a: 被拖欠工资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 1b: 加班时间越长 精神健康状况越差;
- 1c: 被强迫劳动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 1d: 对劳动权益有意见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外来工精神健康是当下生存状态的反映,而劳动权益状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外来工工资水平较低,生存压力较大,被拖欠工资者往往感受到较大的经济压力。在工作中,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久,缺乏自由活动与放松身心的机会,身心会越疲惫,员工可能产生心理压力以及焦虑、烦躁等情绪,也可能因为疲劳而发生工伤。被强迫劳动导致劳动者工作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影响到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和工作时的情绪,可能会损害精神健康。对劳动权益是否有意见,是一个主观变量,反映了不同外来工对权益状况的敏感程度和主观认识,对劳动权益有意见者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差。

假设 2: 劳动条件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具体而言:

- 2a: 冒险作业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 2b: 工作环境有危害 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我们采用是否冒险作业以及工作环境是否有危害两项指标来测量外来工的劳动条件。劳动安全保障是劳动权益的基本要求,但实际上许多工人因为工作原因经常暴露在对身体健康有毒有害的粉尘、气体或噪音中,或者缺乏基本的安全措施,这样的劳动条件会直接影响外来工的身体健康,一旦身体受到损害,往往会表现在精神健康上。即使身体健康一时没有受到侵害,但外来工也可能出现焦虑、紧张或恐慌等影响精神健康的心理状态。

假设 3: 社会支持有益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具体而言:

- 3a: 有企业内部朋友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好;
- 3b: 生产班组中有老乡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好;
- 3c: 参与社会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和妇联)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好。
- 3d: 与本地人交往有困难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在假设 1 和假设 2 中,我们主要想探讨的是哪些因素损害了外来工的精神健康,而假设 3 则试图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哪些社会支持有益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朋友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是否在本企业内部有朋友反映了外来工在工作场所的社会支持状况,有朋友,则精神状况也可能较好。对于外来工来说,老乡不仅仅能够提供物质帮助,也能够提供较多的情感支持。工作班组中老乡多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较

好。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组织能够为其成员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因此我们假设参与这些组织者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好。除以上指标外,是否存在交往障碍也可能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如果外来工无法与本地人交往,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网络,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较差。

二、抽样与测量

(一) 抽样

由于缺乏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和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①外来工总体的抽样框,使得我们难以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开展调查。这也是几乎所有的流动人口或边缘人群的抽样调查中曾经遇到的问题(Salgani & Heckathorn 2004)。因此,我们以城市外来人口的相对比例作为样本分配根据,将各省市政府部门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2008;江苏省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6;浙江省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浙江省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处 2006;广东省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中性别、产业、地区分布作为参数进行配额。具体而言,根据以上统计数据,计算出长三角和珠三角19个城市的外来工总数,然后按照各城市占总体的比例分配样本,再进行微调,将低于100样本的城市调至100,最终确定各城市样本配额;在城市内部,又根据分性别、产业和地区外来工的分布制订了配额表,每个城市的分配方法是一致的;在企业样本的数额分配上,我们规定:企业规模在30人以下的,只做一份。企业规模在30-299人之间的可做3份。规模在300人及以上的,则可做5份,多份问卷须选择不同性别、工种、年龄或来源地的外来工。本次调查的访问员由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②组成,根据配额信息和便利原则选择被访者。同时,在调查执行过程中,课题组与各地访问员之间每天汇总样本信息,随时调整使之符合配额分布。

最终,我们在两地区19个城市共获得有效样本4152份,分布在

① 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东莞、惠州、中山和江门;长三角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宁波、嘉兴和绍兴。

② 包括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负责珠三角9个城市)、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负责上海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负责江苏5个城市)、浙江工商大学社会工作系(负责浙江4个城市)。

3264 家不同规模、性质和行业的企业中。

总之,这样的抽样方式是一种大样本、多地点、多机构合作的非概率抽样方式(nonprobability sampling)。相关研究表明,此种非概率抽样方式有助于克服抽样时的地理集中(geographic concentration)和隐藏的选择偏见(hidden selection bias),从而可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推论统计的可靠性(Guo & Hussey, 2004)。因此,本文所用数据尽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样本,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非随机抽样的局限性,因而,本文可视为一个探索性研究。

(二) 测量

本次调查的主题是劳动权益问题^①,“富士康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我们对外来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因此问卷中加入了GHQ-12^②来测量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作为一种筛查量表,GHQ-12的目的在于快速筛查出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指出的是,GHQ-12所测量得出的高危人群不表示该群体存在严重的精神问题或精神疾病,只是表明与低危和中危人群相比,其中存在精神疾患的个体的比例较高。若想确认是否患病,还需要进一步客观、全面、准确的心理诊断。

GHQ-12为总加量表,是将目前(1-4周)的精神健康状况与平时进行对比。我们询问最近两周与平时相比的情况。该量表选择项为“完全没有”、“与平时一样”、“比平时多一些”、“比平时多很多”。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建议(石其昌等,2005),我们采用0-0-1-1赋分方法,即选择前两项均记为0分,选择后两项均记1分。因此,12个条目之和的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12分,最佳分界值为3/4分(杨廷忠等,2003)。根据测量结果,参照石其昌等(2005)及张杨等(2008)的研究,我们将外来工分为高危人群、中危人群、低危人群三类。高危人群表示GHQ-12测量结果大于等于4分,中危人群为2或3分,低危人群为0或1分。

① 利用此次问卷调查数据,我们已经发表了《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刘林平等,2011)一文。

② GHQ-12的问题设计、使用方法、效度与信度分析参见:Goldberg et al., 1997; Makowska et al., 2002。该量表应用于中国人的情况参见:杨廷忠等,2003;张杨等,2008。

三、统计分析

(一) 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及与其他群体的比较

统计显示,外来工精神健康的低危人群占 66.4%,中危人群占 18.9%,高危人群占 14.7%。与近期相关研究(与本研究采用相同量表和相同赋分方法)的结果(见表 1 左栏)比较,外来工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并不比其他群体更为严重。如一般成人人群中高危人群最高比例为 36.9%,最低为 12.5%,大多高于 15%。与之相比,外来工精神健康相对较好;与其他工作群体相比,也明显好于石油作业人员、护士和铁路女工;与其他青年群体(如大学生和青少年)相比,外来工中高危人群所占比例也相对较低。

表 1 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与其他群体的比较

数据来源	调查地点	调查对象	样本量	分界值	高危人群比例 (阳性检出率)
本调查(2010)	长三角 珠三角	外来工	4152	≥4	14.7%
汤济松等(2002)	近海	石油作业人员	561	见注(1)	29.4%
石其昌等(2005)	浙江省	15岁及以上人群	14639	≥4	20.7%
袁家珍等(2005)	上海市	16岁以上社区人群	2749	≥3	15.2%
张燕敏等(2005)	浙江省	15-19岁青少年	1194	2/3	23.2%
贝志红等(2009)	广西桂东	综合医院护士	190	见注(2)	42.1%
顾华康(2009)	不明	铁路女工	1965	3/4	41%
崔春青等(2009)	河北省	18岁及以上人群	14408	≥4	16.4%
陈婷婷等(2010)	广州市	医学院学生	538	≥4	64.9%
丁志杰等(2010)	天水市	18岁及以上人群	10249	≥4	17.9%
逢淑涛等(2010)	青岛市	18岁及以上人群	4776	≥4	16.2%
茹建国等(2010)	乌鲁木齐	18岁以上社区居民	1156	≥4	36.9%
宋志强等(2010)	青海省	18岁及以上人群	11178	≥4	12.5%
张敬悬等(2010)	山东省	18岁及以上人群	22718	≥4	14.2%

注:(1)该研究采用 Likert 4 分法(0,1,2,3)对 GHQ-12 赋分,某条目得分为 2 分或 3 分为阳性,12 个条目中任何 3 个条目为阳性,则判定为“精神状况差”的高危人群。

(2)该研究未报告具体赋分方式,得分超过 27 分者被判定为“心理状况不佳”的高危人群。

(二) 自变量统计描述

本部分主要对自变量进行简要说明,并比较高危人群与非高危人群的组间差异。我们将个人变量、生活环境、企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解释变量为劳动和人身权益状况以及社会支持状况(见表2)。

表 2 自变量统计描述

控制变量	非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总体	解释变量	非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总体
年龄(均值)	30.93	27.75	30.45	拖欠工资(%)			
性别(%)				无	96.31	95.64	96.21
女	45.46	46.23	45.58	有	3.69	4.36	3.79
男	54.54	53.77	54.42	加班时间(%)			
教育年限	9.91	10.81	10	0≤小时<2	45.57	42.21	45.08
婚姻(%)				2≤小时<4	40.02	41.04	40.17
未婚	38.21	59.59	41.3	4≤小时	14.41	16.75	14.75
已婚	61.79	40.41	58.7	强迫劳动(%)			
身体健康(%)				无	95.56	91.62	94.98
不好	4.76	8.71	5.34	有	4.44	8.38	5.02
正常	95.24	91.29	94.66	冒险作业(%)			
地区(%)				无	95.96	94.64	95.77
珠三角	47.39	59.13	49.12	有	4.04	5.36	4.23
长三角	52.61	40.87	50.88	工作环境危害(%)			
来源地是否本省(%)				无	82.03	75.54	81.07
本省	25.81	26.63	25.93	有	17.97	24.46	18.93
外省	74.19	73.37	74.07	对劳动权益有意见(%)			
收支比	2.92	2.52	2.86	无	79.23	69.85	77.85
居住地点(%)				有	20.77	30.15	22.15
企业内	38.08	42.45	38.72	本企业有无朋友(%)			
企业外	61.92	57.55	61.28	无	28.61	30.82	28.93
工种(%)				有	71.39	69.18	71.07

续表 2

控制变量	非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总体	解释变量	非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总体
普工	47.36	44.93	47.01	班组有没有老乡(%)			
技工	23.02	19.76	22.54	没有	26.35	23.45	25.92
中低层管理人员	19.73	24.49	20.42	较少	49.85	51.76	50.14
其他	9.89	10.82	10.03	较多	23.8	24.79	23.94
产业(%)				组织参与(%)			
二产	71.92	67.84	71.32	无	86.23	85.76	86.16
三产	28.08	32.16	28.68	有	13.77	14.24	13.84
企业规模(%)				与本地人交往的困难(%)			
1-99人	32.2	31.41	32.08	无	37.29	24.29	35.38
100-299人	24.02	18.85	23.26	有	62.71	75.71	64.62
300-999	20.58	20.03	20.5				
1000以上	23.2	29.71	24.16				
企业性质(%)							
国有或集体	9.54	9.46	9.53				
私有	72.94	72.13	72.82				
外资	6.73	9.8	7.18				
港资	5.57	4.56	5.42				
台资	5.22	4.05	5.05				

1. 控制变量

在人口特征方面,总体平均年龄为 30.45 岁,其中高危人群为 27.75 岁;男性占 54.42%;58.7% 已婚,而高危人群中已婚者仅 40.41%;平均教育年限为 10 年,而高危人群的受教育年限接近 11 年;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估较为困难,我们采用自评法进行测量,有 5.34% 的外来工明确表示自身健康状况不好,而高危人群这一数字上升至 8.71%。

在地区方面,珠三角占总体的 49.12%,但在高危人群中,却高达 59.13%,可能珠三角外来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差于长三角;从来源地看,样本中大多数都是跨省打工的外省人,近 26% 为本省人,高危人群和非高危人群的组间差异并不明显。

收入和支出状况对外来工的生活影响甚大,在此,我们构建一个辅

助变量收支比,即月收入与支出的比值,收支比越高则经济压力越小。从表2可见,高危人群的收支比低于非高危者。居住环境会影响到个人的精神健康,我们将居住地点分为企业内和企业外,企业内主要指员工宿舍和工作场所,企业外则包括出租屋、自购房、借宿等。居住在企业内近39%,高危人群略高,大部分外来工住在企业外。

我们把工种分为普工、技工、中低层经营管理人员、其他等四类,其中普工近一半,占47%。高危人群中,中低层经营管理人员较高,约24.5%。外来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因此我们把产业分为二产(制造业与建筑业)和三产(服务业),高危人群中,三产比例占32.16%,比非高危人群高4个百分点。

企业规模和性质是重要的组织特征。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劳资关系越规范,但是劳动控制过程也可能越严格;不同性质企业的管理模式、劳资关系取向可能不同,一般来说,国有、集体或外资企业劳资关系较为规范。不同性质和规模企业的管理制度直接影响外来工权益状况,也会影响他们的精神健康。在规模上,高危人群中,在1000人以上规模企业者近30%,明显高于非高危人群;在性质方面,只有在外企中高危人群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但差异并不明显。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中,测量劳动权益状况主要指标包括工资拖欠、加班、强迫劳动、冒险作业、工作环境等。具体来看,3.79%的外来工过去半年来曾经被拖欠过工资,高危人群中则有4.36%;工作时间是反映劳动权益的重要变量,每天加班时间在2小时以下者占总体的45%,4小时以上者占14.75%,而高危人群中加班4小时以上者占16.75%;是否存在强迫劳动通常反映企业的管理模式,5%的外来工在本企业遭受过强迫劳动,而高危人群则占8.38%;工作中存在冒险作业的占4.23%,而高危人群则占5.36%;工作环境有无危害是指外来工工作的场所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的物质、气体或噪音等,有近19%的外来工表示工作环境存在危害性,其中高危人群占24.46%。

另外,调查还直接询问了“您就劳动权益问题对企业是否有意见?”此处劳动权益指工资、工时、加班工资、福利保险、劳动合同、劳动安全与卫生等方面的问题。结果表明,过去一年来,22.15%的外来工对所在企业的劳动权益方面有意见,其中高危人群则高达30%以上。

在社会支持方面的数据表明,总体上28.93%的外来工没有本企

业朋友 高危人群与非高危人群之间的组间差异并不明显。同时我们询问了他们所在班组中老乡的多少。如果是外省人,我们以省为界定义老乡;如果是本省人,我们则以市为界定义老乡。数据表明,近 26% 的表示没有老乡,约 50% 的表示老乡很少,近 24% 的表示老乡较多。高危人群与非高危人群的组间差异并不明显。

组织参与是指外来工是否是共产党、共青团、工会、妇联的成员,参与其中一则表示有组织参与,数据显示 13.8% 的外来工有组织参与。另外,我们还在调查中,询问了他们与本地人交往是否存在困难,64.62% 表示存在困难,而高危人群中表示存在困难的达 75.71%。

综上所述,从控制变量来看,年轻、未婚、教育程度高、收支比低、中低层经营管理人员、从事三产、在千人以上大企业者精神健康状况稍差,属于高危人群的可能性更高;在我们将要研究的解释变量中,强迫劳动、工作环境危害、对劳动权益有意见等都可能提高外来工成为高危人群的可能性。但这仅仅通过频数描述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将在下文中建立模型以检验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因素。

(三) Logit 模型分析

我们以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具体来说,根据 GHQ-12 测量结果,我们将因变量分为高危人群和非高危人群(低危和中危人群),这是一个二分类别变量,因此采用二分 Logit 模型(见表 3)。

从表 3 可知,控制变量中的教育年限、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区域、月收支比是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显著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已婚者成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①只有未婚者的 63.3%。这表明婚姻存在一定的精神慰藉作用。另外,月收支比越高者,精神健康状况越好,这表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与经济压力密切相关。

在解释变量中,加班时间(4 小时及以上)、强迫劳动、环境危害、对劳动权益有意见、生产线老乡(较多)、与本地人交往有困难是显著变量。具体而言,每日加班时间在 4 小时及以上的外来工成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是加班时间在 2 小时以下者的 1.2 倍,假设 1b 得到支持;被强迫劳动者成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是未被强迫劳动者的 1.48 倍,假设

^① 发生比指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郭志刚主编,1999)。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相应发生比的变化为 $(e^{\beta} - 1) 100\%$ 。

表3 外来工心理健康状况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率
年龄	-.00892	.00816	.991
女性(男性=0)	-.0462	.101	.955
教育年限	.0829***	.0195	1.086
已婚(未婚=0)	-.458***	.139	.633
身体健康正常(不好=0)	-.401*	.184	.670
长三角(珠三角=0)	-.406***	.101	.666
外省人(本省人=0)	-.171	.116	.843
月收入比	-.0678*	.0298	.934
住在企业外(企业内=0)	.0595	.254	1.061
工种(普工=0)			
技工	-.189	.132	.827
中低层经营管理人员	.0925	.132	1.097
其他	.115	.167	1.121
服务业(制造业=0)	.134	.115	1.143
企业规模(1-99人=0)			
100-299人	-.219	.138	.804
300-999人	-.134	.139	.874
1000人以上	.179	.134	1.197
企业性质(国有=0)			
私有	.0893	.172	1.093
外资	.301	.223	1.351
香港	-.498	.272	.608
台湾	-.442	.286	.642
被拖欠工资(无=0)	-.102	.241	.903
加班时间(0≤小时<2=0)			
2≤小时<4	.0769	.112	1.080
4≤小时	.188*	.143	1.207
强迫劳动(无=0)	.393*	.193	1.482
对劳动权益有意见(无=0)	.301**	.111	1.351
冒险作业(无=0)	.218	.228	1.244
环境危害(无=0)	.220*	.123	1.246
有企业内朋友(无=0)	-.147	.103	.863
生产线(班组)老乡(无=0)			
较少	.188	.12	1.206
较多	.396**	.141	1.486
组织参与(无=0)	.116	.145	1.123
与本地人交往有困难(无=0)	.625***	.111	1.868
截距	-2.242***	.507	
样本数	3890		
Pseudo R ²	.0757		
分类正确率①	85.50%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① 分类正确率(correctly classified) 指模型成功预测的个案数占总样本的比例, 是反映 Logit 模型拟合程度的指标(汉密尔顿 2008)。

1c 得到支持;对劳权有意见者成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是没有意见者的 1.35 倍,假设 1d 得到支持;工作环境有危害者成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是没有危害者的 1.25 倍,假设 2b 得到支持;与本地人交往有困难者成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是无困难者的 1.87 倍,假设 3d 得到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统计显示生产线老乡数量与外来工精神健康显著相关,但却与研究假设的影响方向相反,即生产线老乡较多者成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是没有老乡者的 1.47 倍。“被拖欠工资”在模型中不显著,假设 1a 未得到支持;同时,冒险作业、有无企业内朋友、组织参与等变量不显著,假设 2a、3a、3b、3c 未获得支持。

综上所述,我们有如下发现:第一,劳动权益状况对外来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加班时间越长,精神健康状况越差;被强迫劳动者,对企业劳动权益有意见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第二,劳动条件显著影响精神健康,工作环境有危害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第三,社会交往显著影响外来工的精神健康,同一生产线上中有较多老乡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与本地人交往有困难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与普通群体(如学生、护士、普通市民等)相比,外来工精神健康问题并不特别突出,仅有 14.7% 的外来工属于精神健康问题的高危人群。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显著变量有两类:一是表明劳动权益状况的指标,包括加班时间、强迫劳动、工作环境等客观指标和对劳动权益有意见这一主观指标;二是表明社会支持状况的指标,包括生产线老乡比例和与本地人交往是否困难。下面,我们对这些变量及其相关变量的作用机制逐一讨论。

(一) 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

1. 工时和工作环境

一般来说,企业为节约用工成本,往往不愿增加员工数量,将有限的员工过度使用。我们的调查表明,16% 的外来工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或以上,31.6% 的每周工作 7 天,14% 的工作 1 个月也没有得到 1 天的休息。他们的身体长期处于疲劳状态,难以得到放松和调节,很容易产

生无聊、烦躁等负面情绪,也容易造成工伤事故。调查还表明,近20%的外来工所在的工作场所存在有害物质、气体或噪音等,这不仅直接危害到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容易产生职业病,进而影响到精神健康。

2. 拖欠工资

被拖欠工资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不显著,数据表明,53.7%的人已经得到了补发,再者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些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如向朋友借钱可以缓解因工资被拖欠带来的经济压力,从而尚未恶化精神健康状况。但是,在控制变量中,收支比对外来工精神健康问题具有显著影响。当前外来工工资普遍较低,也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尤其在城市物价水平较高并不断上涨,但工资却得不到同步增长的情况下,这不可避免地会给外来工造成心理压力。

3. 强迫劳动和冒险作业

在回归分析中,强迫劳动对外来工精神健康具有显著影响,而冒险作业则没有。从事冒险作业的约74%是“80后”男性外来工,尽管意识到了工作存在危险,但他们往往习以为常,并没感觉到恐惧或压力。而强迫劳动(7%)直接违背劳动者意愿,其个人自主性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会给劳动者心理造成直接、持续的压力。

4. 对劳动权益有意见

本文中,劳动权益主要由一系列客观指标构成,但是不同人的认识和感受不同,因而对劳动权益状况的评价可能不同。对劳动权益是否有意见反映了劳动者的心理敏感程度和权益意识,心理越敏感、权益意识越强,越能够感受权益问题的存在,更容易产生精神健康问题。

5. 地区比较

珠三角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明显差于长三角。我们发现,31项有关劳动权益保障的重要指标,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有22项存在显著差异,除工伤保险和带薪年假外,其余20项长三角均好于珠三角地区,特别表现在工资水平、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购买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刘林平等,2011)。因此,我们可以做出推测,劳动权益状况的差异是导致两地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差异的主要原因。

简言之,在现有的用工模式下,劳动权益是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恶化工人精神健康的分析仍然符合中国当前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夸大外来工的精神健康问题,样本中外来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总体上处于正常水平。但与白领、大学生

等由于情感、理想、就业、前途等问题所产生的迷茫、抑郁、焦虑不同,外来工精神健康问题主要是由劳动权益问题引起的,而劳动权益又与他们的生存状况紧密相关,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仍然是争取体面劳动,维持基本生存,因此,我们认为外来工精神健康问题仍然属于传统的生存型精神健康问题。

(二) 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

本研究还表明,生产线上老乡数量较多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这可能表明,尽管老乡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社会支持,但同一生产线上的老乡因其同质性可能更容易形成相互竞争乃至攀比,从而恶化精神健康状况。同时,同一生产线上的老乡关系也可能是上下级关系(如拉长和普工),这也构成压力的来源。换言之,老乡关系可能与工厂内部的竞争关系和等级关系扭结在一起,从而构成外来工面对的新压力源。

本研究还发现,与本地人交往是否通畅是影响精神健康的显著因素。这可能与外来工相对封闭的社会交往模式乃至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用工管理模式存在关联。首先,相当数量的外来工居住在企业宿舍中,他们过着“宿舍—车间—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其交往范围自然就限于工友和一同进厂的老乡,缺乏与本地人接触的机会。其次,由于大量企业存在超时加班现象,疲惫不堪的外来工在加班后的第一要务是休息,他们有效的社会交往时间也随之被压缩。由此可见,消除外来工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障碍既要消除语言和歧视等具体障碍,也要调整既有的用工管理模式,改变长期加班的现状。

此外,我们发现企业内部是否有朋友、是否有组织参与,对外来工精神健康没有显著影响,这些因素并不能有效缓解外来工的精神压力,提高其精神健康水平,社会支持作用没有得到体现。根据我们在珠三角的调查,许多企业对亲友、老乡等非正式关系比较抵触,刻意切断外来工的网络关系,不允许亲友、老乡在一个班组工作,在一个宿舍居住,将他们原子化,以防他们拉帮结伙对抗企业正式管理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来工社会支持网的建立和效用的发挥。而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社会组织在外来工中覆盖率较低,影响面较窄,而且具有浓厚的官方特征,一方面较少向他们提供维权或生活帮助,另一方面也很少深入到外来工中真正关怀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精神健康。因此,我们希望这类社会组织尽快改变传统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在解决劳动争议、

缓解工作压力、改善工作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向外来工提供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力量。

(三) 精神健康应是劳动权益的组成部分

本文的结论还引申出工人精神健康本身是否构成劳动权益的组成部分的议题。与国际上存在的将精神健康与压力方面的问题纳入国际劳工标准的趋势(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3)不一样,中国的劳工标准还未将精神健康纳入议事日程。不仅如此,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的某些制度还限制了工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以工伤为例,它不仅给个人带来身体损害,也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工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理所应当却于法无据。不但《工伤保险条例》(2003年公布,2010年修订)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条更是排除了工伤者依据民事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向用人单位索赔的可能。该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我们推测,导致劳工标准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排斥工人精神健康议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分层次”解决劳动权益问题的思路,即认为相对于工人的精神健康,身体健康更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经验层次上,我们很难区分管理者对工人的一次辱骂对工人的损害大还是一次加班对工人的损害大,前者可能演变为工人的极端行为(如自杀或杀人),而后者足够休息就可能恢复。在理论层次上,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告诉我们,异化的过程是身体受损和精神受损的同步过程(马克思,1979)。因此,我们主张,精神健康是劳动权益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建构模型,证实了劳动权益的若干变量对外来工人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不是偶然的、随机的,而是受到系统性因素的影响,它也主要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的问题。进而言之,外来工的精神健康问题是体制性或制度性的,它的发生与资本稀缺、劳动剩余的基本国情有关,与“过度消耗”劳动力的粗放式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与“规训”和“军事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有关,与立法不完善、执法不到位的劳动法体系有

关,与专注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后果的“GDP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有关,与维护劳工权益的社会力量弱小的社会环境有关。它同时也说明,劳动权益从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工伤频发等外显的问题开始向工人精神健康的“内伤”发展,而对此进行的干预绝不仅是心理医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绝不仅是一个人文关怀的问题,更需要反思“强资本、弱劳工”的总体格局,反思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反思经济发展的目的与社会和谐的真正内涵,从而对精神健康问题开出一个内外兼顾、辨证施治的“总体性”治疗方案。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我们只是初步证实了劳动权益与外来工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其中许多机制在本文中未能充分挖掘,例如,在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之间可能还存在应对方式、工作压力源等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未能充分考虑到;又如,社会支持不仅可能是与劳动权益共同作用于精神健康的因素,它也可能是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之间的调节变量,即社会支持在有利于精神健康的同时促进劳动权益的保护。我们的观点与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随机样本的、更大规模的专题实证研究来验证。

参考文献:

- 贝志红、江乙、陈杏芝、薛梅、郑沛英、徐维俭 2009,《综合医院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齐鲁护理杂志》第7期。
- 布雷弗曼,1978,《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萱、陈卫和、张其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布若威 2008,《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蔡禾、刘林平、万向东 2009,《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陈黎 2010,《外来工社会排斥感探析: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社会》第4期。
- 陈荣炎、胡珊霞、南公宣 2010,《一路砍伤六女子 行凶男子坠楼亡》,《新快报》5月17日(<http://epaper.xkb.com.cn/view.php?id=506779>)。
- 陈婷婷、荆春霞、杨光、王莽峰、方丽、黄怀颖、陈丽明、吴峰岳、罗子峰 2010,《医学生压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公共卫生》第11期。
- 崔春青、陈红梅、刘翠欣、张亚红、屈建新、于慧静 2009,《河北省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精神医学杂志》第2期。
- 迪尔凯姆,1996,《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丁志杰、王刚平、裴根祥、管让成、何蕊芳、费立鹏、李献云、张永录、汪东明、洪贵子、杜鹤宇、白爱萍、李刚、王小全、魏长礼、李宏、王军 2010,《甘肃省天水市18岁及以上人群精神障碍

- 流行病学调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3期。
- 龚承柱、郑玲、郭俊、胡锐、郑璐 2008,《武汉市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状况调查》,《消费导刊》第18期。
- 顾华康 2009,《工作和家庭压力对铁路女工心理及生殖健康的影响》,昆明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广东省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2005年广东省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郭志刚主编,1999,《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汉密尔顿 2008,《应用STATA做统计分析》,郭志刚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何雪松、黄富强、曾守锤 2010,《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胡军生、程淑珍 2008,《师范大学生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2期。
- 黄小伟 2010,《深圳市政府:富士康跳楼是多种原因叠加》,《凤凰财经》5月27日(<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00527/2241319.shtml>)。
- 江苏省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6,《2005年江苏省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康来云 2004,《农民工心理与情绪问题调查及其调适对策》,《求实》第7期。
- 李晓芳 2004,《青年民工心理卫生状况调查分析》,《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第6期。
- 李培林、李炜 2007,《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10,《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 2010,《“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http://download.tech.sina.com.cn/content/49003.html>)。
- 刘林平、郭志坚 2004,《企业性质、政府缺位、集体协商与外来女工的权益保障》,《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刘林平、雍昕、舒玢玢 2011,《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廖传景、毛华配、宫本宏 2010,《城市农民工精神健康及群体差异调查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生态经济》第5期。
- 马克思,1979,《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 潘毅 2007,《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
- 逢淑涛、王冠军、孔伶俐、张永东、孙波、殷松、李献云、费立鹏 2010,《青岛市18岁及以上人群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3期。
- 钱胜、王文霞、王瑶 2008,《232名河南省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第4期。
- 茹建国、马金凤、刘继文 2010,《2010年乌鲁木齐市社区居民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新疆医科大学学报》第4期。
- 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2008,《2007年上海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石其昌、章健民、徐方忠、费立鹏、许毅、傅永利、顾卫、周夏江、王淑敏、张澄、俞敏 2005,《浙江省 15 岁及以上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第 4 期。
- 宋志强、杜欣柏、韩国玲、简冶拉、刘川、费立鹏、李献云、安海生、申柏岭、郑涛、刘兰香、阿怀红 2010,《青海省 18 岁及以上人群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 3 期。
- 汤济松、陈维清、林艳足、凌志明、黄子惠、余德新 2002,《561 名近海石油作业人员精神健康调查》,《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志》第 2 期。
- 田国垒、吉玲 2010,《他们的青春如何安放》,《中国青年报》5 月 21 日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5/21/content_3242356.htm)。
- “外来农民工”课题组,1995,《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状况》,《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 万向东、刘林平、张永宏 2006,《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与外部环境——珠三角与长三角外来工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第 6 期。
- 王春光 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2006,《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谢勇 2008,《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中国人口科学》第 4 期。
- 徐明天 2010,《媒体为何回避富士康员工跳楼真正原因》,《一财网》5 月 27 日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5/354625.html>)。
- 徐香芬、朱敏慧、李同归、施承孙 2006,《120 名私企外来务工人员精神健康状况调查及其与应付方式间的关系研究》,《实用预防医学》第 1 期。
- 杨廷忠、黄丽、吴贞一 2003,《中文健康问卷在中国大陆人群心理障碍筛选的适宜性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第 9 期。
- 袁家珍、朱为冰、李学海、朱紫青 2005,《2749 例社区人群一般心理健康问卷(GHQ)调查分析》,《上海精神医学》第 17 卷(增刊)。
- 张敬悬、卢传华、唐济生、邱慧敏、刘兰芬、王松波、王爱祯、张天亮、费立鹏、李献云、张韶东、江永华、赵长英、胡伯文、曹学义、张艳、高春霓 2010,《山东省 18 岁及以上人群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 3 期。
- 张燕敏、肖晓芬、章健民 2005,《浙江省 15-19 岁青少年心理卫生状况的调查分析》,《浙江医学》第 8 期。
- 张杨、崔利军、栗克清、江琴普、孙秀丽、高良会、韩彦超、李建峰、刘永桥、严保平、吕华、杨保丽 2008,《增补后的一般健康问卷在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的应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 3 期。
- 赵延东 2008,《社会网络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社会》第 5 期。
- 浙江省 1% 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浙江省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处 2006,《2005 年浙江省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朱考金 2003,《城市农民工心理研究》,《青年研究》第 6 期。
- 朱力 2002,《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第 6 期。
- Chan, A. 2001,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New York: M. E. Sharpe, Armonk.
- Chen, F. 2007, "Individual Rights and Collective Rights: Labor's Predicament in China." *Com-*

- mi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0(1) .
- Goldberg , D. P. , R. Gater , N. Sartorius , T. B. Ustun , M. Piccinelli , O. Gureje & C. Rutter 1997, "The Validity of Two Versions of the GHQ in the WHO Study of Mental Illness in General Health Care."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7.
- Guo , S. & D. L. Hussey 2004,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30(3) .
- House , J. S. , D. Umberson & K. R. Landis 1988, "Structures and Process of Social Suppor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3 , *ILO Standards-related Activities in the Area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n In-depth Study for Discussion with a View to the Elaboration of a Plan of Action for Such Activitie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Jacobson , D. 1986, "Types and Timing of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7.
- Lazarus , R. S. & S. Folkman 1984 , *Stress ,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
- Lin , N. & W. Ensel 1989, "Life Stress and Health: Stressors and Resour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 Makowska , Z. , D. Merez , A. Mościcka & W. Kolasa 2002, "The Validity of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s ,GHQ-12 and GHQ-28 , in Mental Health Studies of Working Peop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15(4) .
- Salgani M. J. & D. D. Heckathorn 2004 "Sampling and Estimation in Hidden Populations Using 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4.
- Selye , H. 1976 , *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 McGraw-Hill.
- Sherraden , M. & J. Martin 1994, "Social Work with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Service Delivery."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37.
- Shen , Q. , Y. Lu , C. Hu , X. Deng , H. Gao , X. Huang & E. Niu 199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ental Health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52(Suppl.) .
- Snow , D. L. , S. C. Swan , C. A. Raghavan , C. M. Connell & I. Klein 2003, "The Relationship of Work Stressors ,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to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mong Female Secretarial Employees." *Work & Stress* 3.
- Van del Poel , Mart G. 1993,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 *Social Networks* 15.
- Wong , F. K. D. & G. Leung 2008,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Mental Health of Male and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Health & Social Work* 5(4) .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责任编辑: 谭 深

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between 1949 and 2006.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6, this paper uses the couple's education and their fathers' social statuses to demonstrate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marriage choic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single-trait model, this study adopts a dual-trait model, placing ascriptive and achievement-oriented match into one single-model simultaneously. It aims at effectively controll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ffects. The analyses show that, since the reform, the educational homogamy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while the matching of family background draws an up-side-down U-shape curve. These results imply a resurgence of patrilineal society, in which the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is reproduced and consolidated by unilateral descent.

Meanings of “*Guomin*” and State-building in Early Modern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Meiji Japan to China's revolution *Guo Taihui* 137

Abstract: Classical Chinese phrase “*guomin*” firstly got the modern Western meanings of belong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Early Meiji Japan. After its return to China, the meanings were more complex. “*Guomin*” in China and Japan shared the same meanings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citizen, such as rights and membership, while it was involved into a network of concepts with other related phrases, implying the strong pursuit for the statism. However, the phrase of “*guomin*” in the two states had many different meanings. After the mid-Meiji period, the phrase tolerated the subject of emperor and the cultural nation, and pushed the mixture between monarchy and pan-nationalism forward; while in late Qing, it became the sign of conflict between constitutionism and republicanism, and came to the nation-state discourse of “Chinese republic”. Modern Japan and China's state-building are the results of inter-reference with the extra-forces, but have taken widely different paths.

REPORT

Labor Rights and Mental Health: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Liu Linping, Zheng Guanghuai & Sun Zhongwei* 164

Abstract: The “Foxconn Incident” has drawn the social concern and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 workers extensively. Based on the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we find that 14.7% of migrant workers are under high risk of mental disease. Compared with other groups, such as students, nurses and citizen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ut it is related with labor rights significantly. Using the Binary Logit model, we find that, first of all, labor right is a major factor aff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 workers; secondly, social networks have little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Under the current labor relationship, we argue that Marx's analysis that labor

alienation cause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workers is also in accord with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addition , we believe that mental health should be a part of labor standards.

REVIEW

The “Study of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Studies”: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es on urban community in China *Xiao Lin* 185

Abstract: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wo types of community-related study: the “study of community” in terms of ontology and the “community studies”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The former considers “community” itself as a concrete object characterized by social cohesion and the latter views it as a special social field in which multiple actors interact and a kind of “lens” through which other theoretical themes could be observed. Based on this distinction , this review discusses latest research development on urban community which could be organized by five themes: state-society and agents , the multiple logic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 in community , the daily life and social classes in community space , and the stratification of communities and differentiation within a community. Furthermore , the author provides a basic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China’s urban communities and both kinds of community studies and gives suggestions to overcome the present limitations.

The Cross-culture Study under the “Vitamin” Analytical Pattern: A summary of Francis Hsu’s overseas research *Luo Jimwen* 209

Abstract: The paper took the “vitamin” analytical pattern as the reference , to summarize and survey Francis Hsu’s cross-culture study on China , Japan , India and America. It is found that the vitamin analytical pattern taken by Hsu could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emic” and “etic” , therefore made the cross-culture study more logical. Furthermore , Hsu’s works made up different prescription to cure different diseases of specific culture. However , inadequacy of Hsu’s research lies in the historical localization and the hypothesis of mean social man. Despite the intuitionism of Hsu which may cause his comparative study less strict , his broad mind and endeavors still deserve admiration and following.

BOOK REVIEW

Looking at World Society from the Deep Inwardness:

Reading Ulrich Beck *A God of One’s Own: Religion’s Capacity for Peace and Potential for Violence* *Li Rongrong* 228